

【文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文论研究述评

卢亚明, 马慧娜

(保定学院 中文系,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在“重返80年代”的理论视野下,20世纪80年代文论研究成为当前学界的热门话题。目前学界对80年代文论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是资料收集与初始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质疑与反思阶段;2000年以来的重返与重写阶段。

关键词:新时期文论;20世纪80年代;文学反思;文学史;人学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3)01-0087-05

随着新时期30年来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逐渐成为历史,与当下逐渐拉开距离。但80年代并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知识框架、思想结构正是80年代建构起来的。80年代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却已然作为一种积淀深深地植入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文学理论中存在的许多重要问题,比如“纯文学”的问题、“人学”的问题等等,都要回溯到80年代去寻找答案。也正是在“重返80年代”的理论视野下,80年代文论研究成为当前学界的热门话题。而我们今天的研究首先要厘清历史上的研究成果,因此,盘点80年代文论研究就成为目前的首要任务。目前学界对80年代文论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20世纪80年代:资料收集与初始研究阶段

对80年代文论最初的研究工作是从资料收集和整理开始的,主要是对当时文论界重大的论争、讨论的资料进行初步的记录和梳理。

在20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讨论是继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讨论之后最重大的论争。最初的讨论发生在文学界,后来扩展到哲学界,讨论文章多达数百篇。早在1981年,人民出版社就编辑出版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论集》,论集中收集的10篇文章当时均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多为探讨性的,观点不尽一致,以便有助于进一步开展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同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辑了《关于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资料集》。此后,随着讨论的展开不断有讨论集问世,这样的工作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

因为讨论主要集中在文学界和哲学界,因此,讨论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学部门编选的,主要是探讨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以及异化的关系;一类是哲学部门编选的,主要是哲学界有关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论争。这一类讨论集除了上面提到的《关于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资料集》外,大多被编入文艺论争集中,主要包括1984年由何望贤、陆荣椿选编的《新时期文艺理论论争集》;1988年由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编辑的《新时期文艺学论争资料》(上、下册),本书所收资料时限为1976年10月至1985年10月,所有资料按专题分类编排,每一专题内分讨论综述、文章索引两项,全书共分23个专题;1991年由陆梅林、盛同主编的《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上、下)》,本书按主题共分13辑,所收文章大都是1979—1989年在全国报刊上发表的,个别文章延至1990年上半年,辑后附有各辑选编者撰写的“综述”;同年还有马玉田、张建业编的《1979—1989——十年文艺理论论

收稿日期:2012-06-03

基金项目:保定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博士基金项目“新时期初文论中的‘人学’话语研究”(2011S03)

作者简介:卢亚明(1979-),女,河北保定人,文学博士,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争言论摘编》,所选资料始于1979年,少量截止于1990年,全书共分16个专题,每个专题前有简短的评介。此书最大的特点是集中体现了各种不同观点的有代表性的言论。这些讨论集体现了整个80年代不同时期的特点,为研究者了解当时的语境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与文学界相比,哲学界的讨论集主要集中在1983、1984年出版,主要包括《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论文集》等。值得关注的是在80年代初期有两部国外讨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译文集出版,分别为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译丛》编辑部编译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译文集)》和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译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问题(译文集)》。在前一个译文集中有两篇阿尔都塞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和《马克思和理论人道主义》,这比1984年出版的《保卫马克思》中译本还要早三年。但在当时阿尔都塞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思想并不占主流。

除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80年代也开始了初步的研究工作。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对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的思想述评,如阎国忠的《朱光潜美学思想研究》(1987),邹土方、王德胜的《朱光潜宗白华论》(1987)等。还有就是对“文革”结束以来第一个十年的文艺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的文章,如《从恢复走向超越——新时期十年文艺理论研究回顾》(汤学智,《文论报》1986年第21期),《新时期十年的文学理论批评》(鲍昌,《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3期)等。

二、20世纪90年代:质疑与反思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距离的逐渐拉开,对刚刚过去的80年代文论开始进入更加深入的研究阶段:

一是继续对文艺论争进行概说式的总结和综述,主要包括吴亦文编的《新时期文艺理论论争概观》(1992)、白烨编著的《文学论争20年》(1998)等。此外,还有综述性文章《新时期文学理论争鸣述评》(王坚,《社会科学述评》1990年第5期),《关于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综述》(庾祖海,《文学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3期)等。

二是出现了对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进行专门研究的专著和博士论文,主要有夏中义的《新潮学案——新时期文论重估》(1996),姚鹤鸣的《理性的追踪——新时期文学批评论纲》(1998),张婷婷的博士论文《新时期文艺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院,1999),后作为《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四部)》出版。

夏著通过“学者批评”个案研究,聚焦刘再复、鲁枢元、李泽厚、刘晓波和刘小枫,采用原典细读的方法,对这些学者的思想进行了细致和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对李泽厚与刘晓波、刘小枫或明或暗的思想交锋进行了精彩剖析,旨在为思想史提供学术资源。此外,夏中义特别指出了80年代文论、美学以及哲学的含混关系,称之为“双重构成”现象:“所谓双重构成,是说新时期文论之‘文’,不仅含文艺美学,更含文化哲学,虽然此文不是彼文,却又彼此纠缠难分。而且,作为一种深入骨髓的整体属性,竟或隐或显地渗透到了每一学者的学理构架的细部。”^[4]并分析了形成“双重构成”的原因:一是最令新时期文坛的理论家忧患的不是艺术,而是处于历史转型期的本土文化建设;二是大陆学界的“思想解放”度与年俱增,从文艺搭台,文化唱戏,到文化哲学独树一帜;三是新时期文论远未获得学术研究所需要的纯净空间,而是在作超负荷运作,诸多不该由文论来承担的使命落到了文论肩上。这意味着80年代文论有着不可避免的跨学科特性,因此,对80年代文论的研究就不能封闭在自身中,很多问题单从文论自身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姚著实则是一部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史论,梳理了从粉碎“四人帮”到80年代末的文论批评,特别注重文论批评的现象研究,重视文学理论批评史与文学创作、社会政治史的密切关系,在“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部分作者将戴厚英的小说《人啊,人!》作为张扬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并指出正是有这样的文学作品出现,理论批评界才与之配合展开了人道主义的大讨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姚鹤鸣对文论批评史的分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前言中说:“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新时期’在80年代末已经走完了它的全部历程,90年代将是另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4]说明作者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作为与“改革开放”共生的“新时期”在80年代与90年代的不同,故此书的“新时期”仅指从粉碎“四人帮”到80年代末这一段时间。

张婷婷的研究注重文艺学学术史的整体建构,将新时期20年来的文艺学历程建构为四部分:“反正”与反思——新时期文艺学的最初步履;主体的伸张——新时期文艺学的主导趋向;文艺本体论的建构与解构;意义重建当中的文论话语。

三是随着曾经在新时期文坛叱咤风云的人物相继逝去,出现了一些纪念文集和思想评传。如王蒙、袁鹰编的《忆周扬》(1998),王欣欣的《朱光潜学术思想评传》(1999)等。这些著作的出版为个案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除专著外,值得关注的是在90年代末出现了一些反思80年代文论的文章。主要有《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录》(杜书瀛,《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拨乱反正,“正”在哪里?——新时期文艺学20年的反思之一》(杜书瀛,《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杜书瀛,《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新时期文艺学反思二题》(杜书瀛、玉立,《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80年代文艺学主流话语反思》(陶东风,《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2期)等。

杜文的反思系列研究就“拨乱反正”的意义与局限、认识论文艺学的功过和对西方现代文艺学资源的吸收三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梳理,指出文艺学已进入一个对话的时代。其中对“拨乱反正”的反思很有新意,杜书瀛认为:一方面,必须充分肯定它在“革命”层面上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应清醒地看到它在学理层面上的肤浅性和“保守”性。针对当时以“文革”以前为参照、为标准的“正”,杜书瀛反问“拨乱反正,‘正’在哪里?”并指出这世上就没有什么现成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只有历史地存在于发展着的现实实践中的“正”,它只能是历史地发展着、在实践中变动着的。

陶文将80年代美学与文艺学话语的基本理论预设追溯到西方启蒙主义现代性,指出80年代有三个主导性话语:一是普遍主体与人的自由解放,包括“主体性”、“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人道主义”等;二是“向内转”,包括从物质世界(“外宇宙”)转向心理世界(“内宇宙”)和从政治等非文学领域转向文学的自身领域;三是科学美学思潮以及美学文艺学研究中科学主义倾向。并从社会学角度(主要是政治视角)对这三种主流话语的政治修辞、意识形态功能进行揭示和反思。这为文艺学的研究开启了一条新的路向。

此外,对新时期文论20年的回顾与总结的文章在90年代末相继出现,主要有《新时期文艺学二十年学术讨论会综述》(高健平,《文艺研究》1998年第5期),《辉煌的20年——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汤学智,《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1期)等。

1996年,谢冕、张颐武在《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中首次提出“后新时期”的说法,说明90年代与80年代已有明显不同,意味着一种“断裂”与“转型”^[3]。诚然,90年代的经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与80年代有了很大变化,传媒凸显,新的知识资源不断涌入,文化研究、后学研究等新的文论研究路向兴起,人们对80年代盛行的研究路向开始进行质疑和反思,甚至以一种更为极端的方式将其视为过时和落后,人们有着急切的解读当下的热情。与90年代研究相比,80年代研究在这一时期要暗淡很多。这一方面与上述80年代研究总体受挫有关,同时也是受到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影响的结果。西方学者海德格尔、阿尔都塞、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拉康等从不同角度对“人道主义”、“主体”的质疑和消解,致使国内学人利用域外理论的话语特权和解构性思维来“超克”80年代的文论思想,而忽视了中西情境的不同以及各种不同话语语言说的语境。借鉴西方的话语对国内的问题进行反思是非常必要的,但无视历史情境的简单否定,不予理睬的“超克”姿态却不利于研究的展开。

三、2000年以来:重返与重写阶段

早在1998年,张旭东就在《读书》上发表了《重访八十年代》,也就是为自己即将出版的一本大多写于80年代后半期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集——《幻想的秩序》所作的序。文中指出“告别八十年代的姿态或许有助于中国知识思想界摆脱种种话语的桎梏和政治的阴影,从而积极地迎接九十年代的课题;但它同时也容易使人有意无意地回避种种当代中国文化思想的与生俱来的立场困境和理论匮乏”,“九十年代文化批评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批判地、历史地介入当下并不取决于它与当下‘贴近’与否、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在更为宽广和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空间里批判地、历史地处理同种种体制化意识形态及其话语主导权的关系,取决于对自身问题史的反省和把握”^[4]。同时指出90年代以来利益和立场的分化为重读“八十年代”恰恰提供了绝佳的背景性,它使我们能够开始把80年代视为一个自在的而非自为的感知、选择、认同和表达过程。但这次“重返80年代”的倡导,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因为当时还缺乏“重返”的充分条件。

2000年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学界越来越重视80年代研究,甚至出现了80年代热。一批有关80年代的访谈录、回忆录、人物传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主要包括:钱谷融、殷国明的《中国当代大学者对话录·钱谷融卷》

(2000),《知情者眼中的周扬》(2003),顾骧的《晚年周扬》(2003),刘锡诚的《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2004)、《文坛旧事》(2005),徐庆全的《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2005),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2006),郝怀明的《如风如火话周扬》(2008),罗银胜的《周扬传》(2009)等。还有一些有关80年代的书籍重新再版,如甘阳主编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2006)等。这些著述为“重返80年代”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另外,对80年代文艺理论家的研究继续深入展开。蒯大申的《朱光潜后期美学思想述论》(2001)梳理了朱光潜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直到80年代的美学思想,其中在“晚年思想”部分对朱光潜“人的整体观点”进行了评述,指出朱光潜的“人的整体观点”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一是人具有肉体和精神两方面各种本质力量,即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二是人的各种本质力量是有机联系的,它们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达到统一,即人的本质力量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5],并分析了其欠缺之处。支克坚的《周扬论》(2004)是不多的专门研究周扬文艺思想的专著之一。全书分上中下三篇,分别探讨了周扬建国前、17年和新时期不同阶段的文艺思想。其中在新时期阶段对周扬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关于现实主义等问题进行的有限反思作了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钱谷融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在钱老90华诞之际,钱老的学生曾利文、王林主编的《钱谷融研究资料选》(2008)问世,书中收集了大量对钱谷融的研究文章,其中“感悟‘人学’”部分集中了对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的评论文章。同年,同属“当代大学者钱谷融研究”课题的徐燕、李红霞所著《钱谷融文艺思想初探》(2008)也与读者见面,作者勾勒了一条从“唯美”到“人学”的钱谷融文艺思想演进脉络。

在“重返80年代”的倡导下,对80年代文学史和文学思潮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2009年,程光炜主编的“80年代研究丛书”出版。这套丛书共有三种:程光炜的《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和他主编的《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八十年代文学事件再讨论》。《文学讲稿》是程光炜为人大博士生开设的课程“重返80年代”的课堂讲稿,对“80年代文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另外两本是近年来研究“80年代文学”的论文集。这些研究力图从多种视角呈现多面、复杂、真实的“80年代文学”,对以往在文学史中既定的叙述进行重新书写。

程光炜认为,目前最紧要的问题是如何将熟悉的“80年代”重新“陌生化”和“问题化”。他认为在差异巨大的“解读”中,“八十年代文学”形成了一个矛盾和不一致的历史“形象”,“在它被置入‘当代’、同时又被剔除‘当代’的复杂过程中,被赋予了正剧/反剧、浪漫/反讽、现实/寓言、意义/非意义、超越/日常和现代批判/后现代自嘲等一连串相互冲突和不协调价值性的内容”,然而,“正是在八十年代文学这一不断摇晃的时间‘钟摆’上,曾经被通行的当代文学史所认可、所确定的许多现象成为了‘问题’,具有了需要继续研究的价值”^[6]。在《文学讲稿》中“怎样对‘新时期文学’作历史定位”一讲里,程光炜对“新时期文学”的提法提出了质疑,主张用单纯时间性的80年代、90年代作为分期来取代这一带有进化论色彩的由政治分期而来的术语^[7]。

在对“8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贺桂梅的研究值得关注,尤其是对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的研究。200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思想史上的个人、社会与国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贺桂梅提交了题为《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个人”观念之辨析》的论文,后收入专著《人文学的想象力》(2005),作为第四章“人道主义思潮及其话语变奏”的内容。文章将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从知识谱系或理论资源的角度分为三种形态:“其一是国际共运或马克思主义历史实践脉络上的异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其一是以五四新文化为主包括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欧洲的现代启蒙话语;另一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在批判现代工业社会基础上产生的生存/生命哲学(‘文化哲学’)”^[8],并以个人观念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连接方式为切入点这一思潮进行深入辨析。在另一篇研究这一思潮的文章《“十九世纪的幽灵”——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重读》(贺桂梅,《上海文学》2009年第1期)中,贺桂梅指出,直到今天,人们仍旧主要以一种80年代式的意识形态而非理论的方式来讨论这一思潮,“人道主义”的诸多表述并非如80年代人们所想的那样有着“天然的合法性”,她主张应当将其视为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话语构造,应该历史地分析这一思潮的话语构成,及其在80年代语境中所扮演的意识形态功能。作者认为,与其说80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是“五四”启蒙运动的人性话语的复归,不如说是50年代至70年代社会主义文化内部的“19世纪幽灵”(指由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话语、19世纪欧洲和俄国浪漫主义小说、以康德为核心的德国古典哲学等构成的人道主义与人性论表述)^[9]。这正印证了汪晖的说法:把80年代与“五四”相连,是为了把50年代至70年代,特别是“文革”指认为“封建”和“前现代”而加以批判,而实际上遮蔽了“新时期”与50年代至70年代的历史联系。这些对80年代文学史、文学思潮的研究无疑对80年代文论研究

有一定的启示。

在论文方面,出现了探讨80年代文学公共性的文章,主要有《论文学的公共领域与文学的公共性》(陶东风,《文艺争鸣》2009年第5期),《文学活动的转型与文学公共性的消失——中国当代文学公共领域的反思》(赵勇,《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等。陶文认为:“正是通过那些呼唤人性和人道主义,肯定人情、人性的文学,公众的个人经验进入了政治公共领域,成为80年代读者公众控诉、告别‘文革’极权主义、重建更加人性化的社会生活和公共空间的重要方式和途径。”^[10]赵文认为,80年代是我国文学公共领域开始成型的时期,而90年代却是文学公共性消失的时期,同时文化消费伪公共领域诞生。

另外,随着“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活动的展开,对新时期文论30年的回顾与总结文章不断出现,主要有:《审美论—语言论—文化论:新时期30年文论发展轨迹》(童庆炳,《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从启蒙思想者到素养教育者——改革开放30年文艺理论的三次转向》(王一川,《当代文坛》2008年第3期),《文明重心的东移与本土传统的复兴——新时期文学理论30年回顾》(代迅,《文艺评论》2008年第2期),《新时期三十年文论研究》(赖大仁,《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等。

综上所述,学界对80年代文论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20世纪80年代是资料收集与初始研究阶段;(2)20世纪90年代为质疑与反思阶段;(3)2000年以来的重返与重写阶段。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80年代文论的研究从初步的资料整理到反思、质疑与重释,研究随之不断深入,80年代文论研究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并为学界所关注。从研究路径看,目前学界主要存在两条思路:一条是“新启蒙”的思路。这种研究对80年代文论基本持肯定态度,主要从反专制,以“人道”反抗“神道”,提倡自由解放等方面阐述;一条是解构“新启蒙”的思路。这种研究对80年代文论主要持反思态度,主要揭示80年代文论的意识形态性,指出其与“现代化叙事”合谋等政治化的一面。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现在需要做的正是对80年代文论的发生期进行认真梳理,弄清其来龙去脉,揭示其发生的根源以及产生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夏中义.新潮学案——新时期文论重估[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4.
- [2]姚鹤鸣.理性的追踪——新时期文学批评论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11.
- [3]谢冕,张颐武.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9-10.
- [4]张旭东.重访八十年代[J].读书,1998(2):6.
- [5]蒯大申.朱光潜后期美学思想述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189.
- [6]程光炜.“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若干问题[J].山花,2005(11):122.
- [7]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6-47.
- [8]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78.
- [9]贺桂梅.“十九世纪的幽灵”——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重读[J].上海文学,2009(1):89.
- [10]陶东风.论文学公共领域与文学的公共性[J].文艺争鸣,2009(5):32.

A Review of Studies in the 1980s Literary Theory

Lu Yaming, Ma Huina

(Department of Chinese,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theoretical vision of “return to the 1980s”, literary theory in the 1980s to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academic world. The current studies of literary theory in the 1980s include three stages: first,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initial research in the 1980s; second, questioning and reflection in the 1990s; third, return and rewrite since 2000.

Key words: literary theory in the new era; 1980s; literary thinking; literary history; human science

(责任编辑 王作)